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边缘群体及其文化生存图景

——以“杀马特”群体为例

余慧娟 杨学燕 张懿嘉

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边缘群体的生存图景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下的边缘群体不必再通过进城来实现自己生活富裕的理想，脱离所处的边缘状态，从而去边缘化，是乡村振兴过程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也是当前社会发展中极易被忽视的问题。本文以我国典型的社会边缘群体——“杀马特”群体为研究对象，旨以区隔理论为解释框架，探寻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边缘群体的文化现象和新发展空间，解释了社会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产生的根源，旨在将边缘文化的半成品去边缘化，为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经济、文化区隔，找到新的思路，进而推动城乡关系从“二元”走向“多元互动”，这既是本文的创新点，也是今后有关边缘群体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杀马特；边缘群体；文化区隔；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中国在几十年走完西方主流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之路后，城乡生存与发展环境产生巨大落差与不平衡，为改变城乡发展差距，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全国范围内践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中国乡村振兴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在这几十年的实践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城乡关系及农工关系失衡现象，导致的“乡下人进城”的尴尬现象及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部分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被不断边缘化，成为难以被当地人认同的边缘人，而作为城乡流动的“杀马特”青年既是背井离乡的“打工仔”，也是在城市生活的边缘人，他们既是城乡文明冲突的产物，也是文化区隔下的时代悲歌。本文以“杀马特”群体为切入点，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流动边缘群体的生存图景。

1 “杀马特”相关研究概述

我国学界关于“杀马特”的研究，从2013年后开始逐渐增加。目前关于“杀马特”这一群体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注“杀马特”的现象表征以及“杀马特”群体的社会身份，认为“杀马特”具有与主流文化相对的青年亚文化群体表征和独特社会身份。“杀马特”群体是中国独特城乡二元格局之外的“第三元”，是不仅物质贫困、文化也异常贫困的“文化贫民”^[1]。二是“杀马特”形成的社会成因及其生存现状。此类研究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探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杀马特”群体的形成和生存现状，认为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城乡关系失调，制造了“杀马特”群体社会地位差序^[2]，这种失调关系下“杀马特”的精神需求是促成这一群体产生的根本原因^[3]。三是从文化层面探讨“杀马特”城市融入问题，认为“杀马特”的城市融入困境主要

是由于位育的失当^[4]、因此造成“杀马特”群体身份认同的断裂和文化认同的二维性^[5]。综上所述，关于“杀马特”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身份、社会诱因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缺乏从城乡关系角度探讨“杀马特”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本文试图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出发，以区隔理论为解释框架，分析“杀马特”这一边缘群体可能的发展空间。

2 从兴起到隐匿的“杀马特”

“杀马特”现象最早出现在日本，当时的日本盛行一股来自欧美的视觉系摇滚风潮。从音乐衍生出的各种夸张、奇异的造型受到人们的追捧，他们用这种造型表达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但“杀马特”传入中国后，它不再与音乐相关，他们的造型受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城市90后非主流文化的感染^[6]。“杀马特”在吸收非主流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他们所理解的城市人形象并试图模仿，在相似的群体中形成自己的风潮，“杀马特”家族由此形成。他们以网络为媒介，以家族的形式成规模得聚集，活跃在他们创建的QQ群中。在“杀马特”家族中，头发可以说是成员之间互相识别的标志，没有夸张艳丽的发型，就不能算是真正的“杀马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人口迁移制度的放宽弱化了城乡二元界线，加剧了社会流动。到了八、九十年代，大量农民冲破城乡阻隔，涌向城市，这一时期中国第一批农民工进城。在现代城市文化和传统农村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的边缘群体逐渐从农民中分化出来^[7]，受到城市文化区隔的农民逐渐被边缘化，进而演化为边缘群体，“杀马特”群体就这样诞生了。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想要学城里人的样式，玩城里人玩的东西，但迫于经济社会压力，

最终变成了“不农不城”的“杀马特”。因此，就形象而言，“杀马特”家族不论男女，大都留着五颜六色的头发、穿着个性的服饰、画着浓艳的妆容，与城市主流文化有着明显区别。在人生追求和理想方面，正如“杀马特教父”罗福兴所说：“杀马特只能追求杀马特，其他东西追求不了，房和车太遥远了。”

由于城镇化的加剧，我国的青年亚文化随之兴起，青年亚文化被有意的区隔为低俗的“杀马特”和高品味的“小清新”两种，伴随这种区隔带来了权力话语和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文化现象。在城市主流文化下，“小清新”被认为是主流的都市青年文化^[1]，“杀马特”却被强势话语制造成了粗俗的青年文化。区隔分层为“杀马特”的边缘化提供了条件，“杀马特”在主流价值观的冲击下被污名化。在他人眼中，“杀马特”是一群穿着奇装异服、留着夸张造型、气质诡异的人，在取得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杀马特这一群体因为与主流文化区别太明显，也迎来了主流社会对其的抵触和污名化。因此，他们的这个形象，是试图接近主流文化的一次失败的努力^[2]。

2013年以前，“杀马特”成为城市工厂的一种风尚，工厂里流动的“杀马特”非常多。2013年以后，非“杀马特”大批涌入“杀马特”家族的QQ群，诋毁和攻击“杀马特”，甚至“网络黑”“杀马特”家族，使得“杀马特”开始减少，QQ群在“杀马特”无法进行正常对话的情况下不得不解散。与此同时，贴吧和论坛上涌现出大批反“杀马特”的帖子和评论，甚至反“杀马特”行动还渗透进了现实生活。基于一系列的“反杀”行动，“杀马特”将自己隐藏了起来，曾经一度聚集在公共场所的“杀马特”身影，如今已很难能够再看到，“杀马特”在公众视野逐渐销声匿迹。2013年以后，一些“杀马特”从城市回到农村，他们有的在乡创业，有的帮助家人发展家庭经济，还有的回村直播宣传家乡产业。所以2019年播放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的导演李一凡强调说他所采访的“杀马特”都是过去的杀马特、退休的“杀马特”。

3 “杀马特”形成的成因

3.1 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区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后我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迁徙制度得到落实，人口流动的限制性因素减少，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成为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城镇化格局形成的标志，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均，加上户籍制度把城市与农村人分隔，城乡发展差距逐步达大，农村

和农业成为服务于城市与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农民为获得由制度非均衡引致的潜在获利机会，进行了自发性的制度变迁^[3]。加上我国人口迁徙制度有所放宽、社会流动增加，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弱化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区隔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随着时间的发展，其界分也从“城乡之间”浸入到了“都市之内”^[4]，在城市形成一种经济和文化区隔。区隔的形成与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权力不对等有关。制度的设置将城市人与农村人分割，使得城乡形成不对等的二元经济结构，而经济基础又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导致人们在生活和文化层面也出现了差序。城乡边缘群体因缺乏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自信而选择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但模仿并没有为这一群体带来身份地位的改变，相反却将他们区隔为差序群体。边缘群体的文化不自信，造成其在自身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断裂，处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的边缘状态。这种差序的存在，让穿梭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被贴上“盲流”、“土气”等标签，二元的隔离让他们成为边缘化的存在。因此，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聚居于城市或隐匿于农村的、缺乏流动机会的边缘青年，无奈地处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空间的末梢，并使得二元对立的社会区隔得以持续至今。

3.2 社会区隔下的“杀马特”

区隔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提出的理论之一，他认为“区隔”指的是区别、分隔，是把社会按照消费、文化再生产等方式划分开来。在布迪厄看来阶级区隔表现出来的是文化区隔、政治区隔、生活风格区隔和一切日常实践的区隔，尤其是美学趣味的区隔^[5]。

从文化承袭的视角上来看，“杀马特”是一种青年对主流社会的叛逆表征，是我国青年在城乡对立的发展过程中对于“非主流”文化的追求。“杀马特”在“非主流”的基础上依据他们自己对审美的理解，构建了他们的亚文化场域。从更深层面来说，“杀马特”现象反映的是当代中国愈加明显的社会区隔，诸如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区隔、青年文化群体内部：如“小清新”与“杀马特”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文明的区隔等^[10]。

从被区隔的角度看，“杀马特”有这样一些特征。造型上，他们穿着奇装异服，留着夸张、出挑的头发，被认为是低俗的审美；经济上，他们收入微薄，消费能力有限；教育上，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多为辍学较早的青少年，正是这些特征将“杀马特”群体区隔在主流之外。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区隔”具有“差异性”和“优越性”双重特性，“差异性”

体现了某种特定文化趣味在同类实践中的位置和差异，这种差异是生物性和心理的，同时也维系了群体的边界。因此，青年亚文化中不同人群及其生活方式可以得到明确分层，而“杀马特”正是这种区隔分层后的群体之一。“杀马特”表现出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通过与其他群体相互对立和排斥来进行界定，而区隔的“优越性”是“差异性”认同的媒介和结果。在社会中，主流阶层掌握了实践行为和话语权，并以身份的优越性批评“杀马特”这种低俗的文化现象，形塑了他们所认为的经济、文化边缘群体的选择权、舆论上的主导权，以及文化表层上的“生杀权”，其后果是：“杀马特”青年在社会位置和心理感知上，都难以获得主流社会人群的认同，从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区隔下显性或隐性的青年亚文化群体。

4 从“二元”走向“多元互动”的去边缘化路径

“杀马特”群体认为城市生活的成本高，机会少，而农村则相对较容易获得那些乡土性的资源，这些资源是他们积累经济资本的手段。对于城市边缘的低收入群体，回归农村无疑是他们的最优选择。“杀马特”群体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产物，是在快速城镇化过程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这一“不农不城”边缘群体问题值得社会关注，而如何去边缘化，城乡融合发展下的边缘群体不必再通过进城来实现自己生活富裕的理想，脱离所处的经济边缘状态，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首先，要素融合、区域融合以及生活方式融合^[1]是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和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推动城乡关系从“二元”走向“多元互动”，打破城市和农村的区隔，彻底解决农村发展问题和农民生产生活困难。在就地城镇化政策引导下，在家乡工作或返乡创业为城乡流动人群提供了更多元的就业机会，这是城乡区隔从“二元”走向“多元互动”的典型特征，这也将成为我国带动农民富裕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 [1] 张天潘.“杀马特”: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J].广西城镇建设,2014(6):36-41.
- [2] 王斌.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差序制造与污名构建--再议“杀马特”群体[J].中国青年研究,2015,000(001):60-64,59.
- [3] 张淑丽,张艳秋.透视“杀马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000(002):62-63.
- [4] 王坤庆,邵会.位育:“杀马特”的安所遂生之道[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3):53.
- [5] 邢媛,陈辉.文化认同视域下“杀马特”群体城市融入维度及路径研究[J].晋中学院学报,2015,000(002):1-5.
- [6] 程为敏.社会流动中的边缘群体[J].农村经济与社会,1994(3):41-48.

其次，边缘群体的去边缘化应从文化着手，培养文化自信，让“杀马特”这样的边缘群体拥有自己的新文化，把他们从文化的半成品变成社会多元文化的一元。文化的去边缘应当聚焦乡土文化本身，如何发展乡土文化，增加边缘群体的文化自信是当今农村发展的重要议题。那些离开农村进城务工的“乡下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村庄共同体文化在现代化资源的侵蚀下，日益残缺并遭受瓦解。如何激发既有的乡村共同体意识，使边缘群体滋生自豪感，形成乡村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发展乡土文化的动力，也将是边缘群体去边缘化的有效途径。

以文化为本位，是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最高境界^[2]。在城乡融合的政策导向下，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的发展，既要依靠国家政策支持、资本下乡、外部社会支持，更要提高乡村组织服务乡村发展的能力^[3]。以乡村组织为载体的文化复兴，旨在培养农民的文化自觉和乡土社会主体文化意识，使他们在真正意义上生成一种农民主体感^[2]，形塑乡村群体的文化自信。

5 结论

乡村振兴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流动边缘群体生存的制度性保障，也是他们摆脱边缘身份的有效途径，文化的去边缘化是根本性问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帮助边缘群体脱离边缘状态的关键。只有认同自身所属的本土文化，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一位置的功能。乡村振兴已经被确定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固然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但战略的着眼点是否只有经济，文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作用以及文化建设该从何处入手，这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此外，流动在城乡之间的边缘群体还有很多，本文仅以“杀马特”这一群体来探讨这些从乡村来到城市并被城市边缘化的群体，期望通过抛砖引玉的研究，让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些乡村振兴中的边缘群体的发展，更好地为我国的乡村振兴事业添砖加瓦。

- [7] 朱志萍.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变迁与城乡一体化[J].软科学,2008,22(6):104-108.
- [8] 朱国华.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布迪厄阶级理论评析[J].江海学刊,2004,000(002):80-85.
- [9] 张乐,常晓梦."杀马特"现象的社会学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4(07):18-21.
- [10] 孔祥智.乡村振兴的九个维度[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 [11] 温铁军,张孝德.乡村振兴十人谈--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解读[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18.
- [12] 耿国阶,王亚群.城乡关系视角下乡村治理演变的逻辑:1949~2019[J].中国农村观察,2019,No.150(06):21-33.